

后的复测结果证明,幼儿园中采取讲故事法向儿童讲解道德标准,并让儿童参加讨论的方法进行训练,可以显著改变儿童原来的“不公正分物”的判断定向和行为。其次,让原来曾表现出“不公正”行为的儿童充当正面行为体现者的角色,参与对同伴中不正确行为的监督和评价,同样可以改变儿童的“不公正”判断,而且这种方法比上述讲故事加讨论的方法对儿童道德认知的改变影响更深刻。

五、结 语

本文概括地回顾了近十年来中国发展心理学者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我们的总结并不能包括这一领域的全部工作。因篇幅所限,很多调查和经验性的研究资料本文没有提及。总的来说,近十年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超过了以往所有研究的总和。我们不仅重复、验证了国外学者的一

些研究,而且根据我国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对我国儿童特有的一些道德观念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的结果已经受到国外同行的注意。有些国家的发展心理学家正在验证我们的结论。大这些研究成果正在被用于国家和各省的道德教育设纲的制订上,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道德教育中,同时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建别提供着科学依据。

以上报告的只是社会认知领域的一部分研究,近年来,我们已开始考虑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一方面,我们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作一些理论思索,以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将我们的研究扩展到道德价值观、道德情感与道德决策等一系列更广阔的领域,并且,尽可能地借鉴和发展一些更有效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当然,科学研究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前进的。

明清小说中的中国棋规 ·柯征·

在明清的白话小说中,有着许多通过围棋来反映作品主题和当时风俗民情的情节描写,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中国古代棋规变化的端倪。

围棋规则的变更,归结起来主要在于贴子制度的变化,围棋棋盘共361个交叉点,从理论上说,占得交叉点过半数者(即181个)为胜,但由于有先行之利以及双方棋力差异等因素,就产生了各种贴子制度;而它的出现,则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东汉时的《孙子算法》载:“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围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乘云,即得。”这一时期到唐宋的大量记载,均未提及贴子问题。明代凌梦初《二刻拍案惊奇》的第二卷《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误终身》,系根据宋代“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等故事改写,其中写宋时小道人国能饶先“与妙观下棋,想着他有言相许,有意让他一分,不尽情攻杀。只下得个两平。算来白子一百八十着,小道人认输了半子。”这一描述表明,直至宋代还未出现贴子规定。在相传为晋朝王质与仙对弈的《烂柯图》,唐代阎景实与顾师言的《金花碗图》等古谱的始局胜负算法上,都可得到证明。

然而,当人们一旦用上述方法来计算明清棋谱的胜负时,就会发现与谱中标明的结果时有出入。原因何在?最早提供答案的当推《金瓶梅词话》。书中第五十四回《应伯爵隔花戏金钏,任医官垂帐

诊瓶儿》,有一段常时节和自来创赌棋的描写,“于是填完了官着,就数起来。自来创看了五块棋头,常时节只得两块。自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常时节只得两块。自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输了五个子”。这种“论块还棋”的贴子方法,在其后的《红楼梦》第九十二回中也有描述:詹光与贾政下完棋,“做起棋来,詹光还了棋头,输了七个子儿。”用这种“还棋头”贴子方法核对一些古谱,如明末清初国手过百龄的对局。即可获得验证。

由此可见,明清围棋开始实行“论块还棋”的贴子规定,毫无疑问,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此法尚在沿用(见一九二九年上海文明书局《围棋入门》)。究其成因,似乎与中国崇尚搏杀的古棋风有关,棋手多通过将对方棋子断裂成多块来显示棋力高强。清代清溪道人的小说《禅真逸史》第二十四就有杜伏威“杀得桑皮筋棋子四分五裂,应接不及”的描述。又据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载:曾国藩“尝与周小松对局,小松授文正以九子,裂其棋为九品,乃仅得活。文正大怒,小松行时遂无碍”。至于《金瓶梅》写宋人下棋,使用的却是明代棋规,也可说是该书“写北宋事,影射嘉靖朝政”的一个佐证吧。